

李大钊研究的理念创新与新领域开拓

——关于深化李大钊研究的一些思考

吴汉全

(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1815)

摘要:李大钊研究在近 10 年来有很大的进展。今后,进一步深化李大钊研究工作,可在李大钊研究的理念上创新,在既有的李大钊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在新的李大钊研究领域的开辟上下工夫。其他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道路”“意识形态安全”“学术中国化”“逻辑谱系”,等等,都可以引进并嵌入到李大钊研究之中。

关键词:李大钊研究;理念创新;新领域开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2-0019-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2.003

Innovating Theories and Opening up New Fields in the Research on Li Dazhao

WU Han-qua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n Li Dazhao over the past 10 years. Future research into Li Dazhao may include: innovating the theories of the research on Li Dazhao, improving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fields, and opening up new fields. Problem consciousness, discourse system, confidence in theories, routes, systems and cultures, Chinese road, ideological security, academic China, and logic tree can a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udy of Li Dazhao.

Key Words: research on Li Dazha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pening up new fields

2006 年,笔者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近 10 年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的文章,在总结李大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未来的李大钊研究提出了一些希望。10

年过去了,李大钊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2009 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纪念李大钊诞辰 120 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人民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李大钊全集》;笔者和裴赞芬、李继华

基金项目:2012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12&ZD108);2014 年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汉全(1964—),男,江苏大丰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等出版了几部李大钊研究专著^①；《唐山学院学报》开辟出“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专栏，为研究者提供了发表李大钊研究论文的阵地；一些高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以李大钊研究为选题，撰写了毕业论文。近10年的李大钊研究，总体上看处于平稳的态势，其成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未能出现1979年和1989年前后的李大钊研究成果。那么，今后的李大钊研究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入下去，这是笔者近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本文将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就以上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李大钊研究理念的创新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的不少李大钊研究文章，没有新的话语、新的概念、新的观点，缺少有亮点的研究成果，或者说缺少点“精气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理念上创新不足。

研究理念上的创新，最主要的是要汲取时代演进中的新观点、新思想、新思考、新判断，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研究时代的特点，并进而将理念贯穿到研究工作之中。李大钊研究要与时俱进，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时代风格，并做出较大的成绩，就必须立足时代的进步，从现实中来汲取营养，不断更新研究理念。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倡导研究“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发表了相关的有影响的文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张静如先生提出要研究李大钊的生产力思想，要研究“李大钊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梦”思想提出后，张静如先生提出要研究“李大钊与中国梦”。在张先生指导下，笔者发表了《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李大钊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思想研究》《李大钊与现代化政党中国

共产党的创建》《早期李大钊对启动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等文章，出版了专著《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等，这些成果可以说都是从时代中汲取了研究的理念。张静如先生之所以是李大钊研究大家^②，之所以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引领李大钊研究不断前进，有一点就是他非常重视并善于汲取时代的理念，并将这种理念准确地运用到李大钊研究之中。这个研究传统，我们需要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十八以来提出了很多反映时代的新理念，“5·17”讲话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诸多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李大钊研究者要努力学习、深刻体会，并运用到李大钊研究之中，这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李大钊研究观念的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研究理念的创新，也可以从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加以借鉴。李大钊研究属于史学研究，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历史学的视域中进行，但也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在研究中也都会形成新的研究理念，是可以为李大钊研究提供某些借鉴的。譬如像“问题意识”“话语体系”“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道路”“意识形态安全”“学术中国化”“逻辑谱系”，等等，都可以引进并嵌入到李大钊研究之中。这对于李大钊研究的理念创新和选题范围的扩大非常重要。研究者如果能够写出诸如《李大钊文化自信思想特色与启示》《李大钊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内在逻辑》《李大钊在学术中国化中的探索及其成就》等文章，一定有助于推进李大钊研究。

① 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吴汉全：《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裴赞芬、宋彬岐：《李大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李继华：《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杨洪章、李继华等：《李大钊思想与著作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② 关于张静如先生对李大钊研究的贡献，可参见吴汉全的《张静如先生对李大钊研究的开拓和创新》，载于《唐山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李大钊研究中的理念还可以依据研究者的学术研究经验,进行有选择的创新。就理论上说,创新来源于实践,理念的创新也是这样。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创新则来源于学术研究这种实践,亦即根据学术研究的经验,提出新的研究理念。这就是说,没有李大钊研究这种学术实践,也就难以提出新的研究理念。譬如,关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朱成甲先生从近代中国社会视域诠释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演进历程,撰写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这一学术名著;而朱志敏教授所著《李大钊传》,则从思想史的视角解读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寻求李大钊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笔者在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中感到,无论是依据朱成甲的研究范式(近代中国历史的诠释范式),还是依据朱志敏的研究范式(思想史的诠释范式),笔者都很难达到他们的研究高度,故而选择中外文化比较的研究范式,撰写了《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一书。笔者在“后记”中写道,本书“只是试图说明李大钊早期思想是一个比较系统的体系,并从中外思想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说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体系”。这里,笔者的“中外思想文化比较”的研究理念,是多年来在李大钊研究中逐步形成的,也可以看作是研究理念上的创新。又譬如,对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公认的研究成果,如果再以“试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对史学研究的贡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等题目,就难以有突破。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在研究理念上进行创新,一方面将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推进到史学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发表了《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将范畴研究与观念史研究引入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在《江海学刊》和《史学史研究》发表了《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等文章。可见,

根据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经验,亦可以有目的地推进李大钊研究理念的创新。

二、在既有的李大钊研究领域“精耕细作”

笔者在不少文章中谈到李大钊研究的“精耕细作”问题,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生前一直赞同这个主张。李大钊研究在李大钊牺牲后就开始了,建国以后的李大钊研究也已经有六十年了,形成了诸多的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对此,我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中的《李大钊研究史》部分,在《近10年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在全国李大钊研究会议综述文章中,都对李大钊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发表过一些看法,提出要进一步“精耕细作”的主张。开拓李大钊研究的新局面,首先要重视“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对前人的研究需要保持“敬重之心”“敬仰之意”,不能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弃之不顾,否则我们的李大钊研究也就失去根基,不能体现研究工作的传承性,也不可能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推陈出新。故而,在“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中需要“精耕细作”。那么,如何进一步“精耕细作”呢?提出以下几点供研究者进一步探讨。

(一)既有研究资料的充实与补充

过去的李大钊研究是建立在李大钊研究资料基础上,而这些年来的李大钊研究发现了不少新资料。研究者将这些李大钊研究的新资料充实、补充进去,能够对既有的研究领域起到深化的作用。譬如,关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这是李大钊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以刘桂生先生、朱成甲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对李大钊早期思想做了创造性的研究,他们遵循着社会史研究理念从近代中国的视角诠释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从而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的早期李大钊的形象,这是李大钊研究的重大突破,并使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今天的年轻学者从事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因为研究起点很高,

难以有很大的突破。但也不是无事可做,“精耕细作”还是有可能的。这些年来发现的李大钊早年的读书笔记、李大钊在翻译日本人著作时撰写的批注,现收录在朱文通编注的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中,这是很珍贵的研究资料。可惜的是没有引起当今的李大钊研究者的重视。如果能够将这些反映早期李大钊思想的资料,加以科学而又比较充分的梳理、诠释,并运用到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中,对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显然是有较大意义的。历史学始终是建立在相关资料基础上的,新资料的运用乃是推动历史学进步的重要路径。李大钊研究者应该高度重视相关的研究资料,并善于在既有的研究领域中不断地补充相关的资料,这是李大钊研究中“精耕细作”的重要方向。

(二)既有研究结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任何研究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能算是终极性的,并不是不可更改、不可补充的研究,李大钊研究也是一样。既有的李大钊研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受制于当时的研究理念、研究资料、学科基础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即使是比较成熟的李大钊研究领域,也不能说研究结论没有一点问题、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地方。由此,今天的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的知识基础、研究理念、研究资料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对于既有的研究结论给予新的论证或相关的修改,这对于深化李大钊研究非常重要。这里,所谓“新的论证”,既包括历史的论证(事实的论证),也包括逻辑的论证;“相关的修改”,主要是就研究结论作部分的修改或完善,当然也包括对既有研究结论前提的考察、既有研究结论形成过程的考察、既有研究结论关联性主张的分析,等等。这对于既有的李大钊研究领域的不断成熟,既有的研究结论继续发挥作用,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既有研究中相关理念的创新或反思

李大钊研究的理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具有历史性的特征,需要根据新的研究理念加以调整或加以发展。因此,对于过去业已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李

大钊研究领域,可以反思过去的研究理念,并依据现代的研究理念加以创新和拓展。譬如,过去的李大钊研究比较常用“革命史”研究理念,并不是说“革命史”研究理念不对,但也需要依据现代的“社会史”理念并结合“现代化”研究理念而加以创新和拓展。这也就需要研究者既有“研究史”的研究视域,亦即能把握李大钊研究的历史,了解李大钊研究在研究理念上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这样才有助于将过去的研究理念加以拓展和创新。又譬如,“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发表的成果也比较多。但这个领域的研究如果再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为题目,就很难写出新意。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研究理念上没有创新,还是沿袭过去的“中国化”概念。如果将“中国化”概念加以创新,研究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中国化的生成模式、中国化的形成机制、中国化的逻辑谱系等问题,然后再与李大钊联系起来,那就会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学者们如能写出诸如“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机制”“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谱系”“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创立”等方面的文章,那就是对“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领域的“精耕细作”,这肯定比“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这样的研究更有深度、更有学术价值,也更有学术启示。再譬如,“李大钊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李大钊研究中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研究的起点较高。不仅有诸如《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等文章的发表,而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出版了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专著。那时,研究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在理念上强调的是整体性、全面性、贯通性,分支性的研究不够,故而题目都较大。其后,笔者以及侯且岸等一些学者,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哲学思想,研究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的贡献,也有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2010 年,袁洪亮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李大钊国民性思想的时代性转变:从“立宪国民”到“无产阶级新人”》(《哲学研

究》2010年第11期),对“人”这个哲学问题有重要的探索,这是对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以上都是从分支哲学角度研究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因而也是在李大钊研究既有研究领域的“精耕细作”。循着这样的研究理念,今后可以研究李大钊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社会哲学思想、教育哲学思想,等等,这可以使李大钊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化。上述皆是对既有研究理念如何创新的反思,希望对既有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化能够有所启迪。

(四)既有研究中诠释方式的更新

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一种诠释,并且都是在一定研究范式中的诠释,从而形成其学术话语体系。这里,诠释方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乃是相互联系的,但根本上取决于研究工作中的研究范式,亦即研究范式决定诠释方式、决定话语体系。所谓的研究范式,乃是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是历史观、研究视域、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的主要问题等因素。研究者知道这样的情况,就可以在对既有的李大钊研究范式予以反思的基础上,对李大钊研究中的诠释视角进行研究,从而推进诠释方式的创新,为形成新的研究结论打下基础。譬如,过去对李大钊的研究,是把李大钊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来诠释的。这本身并没有错,但亦有其局限,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没有充分注意到李大钊作为文化人、学者的一面。笔者撰写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是在张静如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强调在看到李大钊是革命家、思想家的基础上,也应该看到李大钊作为学者、文化人的一面,尤其要看到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开创者的身份,这是一种学术的、文化的诠释方式,与过去的政治的诠释方式是不同的。又譬如,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朱成甲先生从近代中国的大背景来诠释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演进,写出了《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学术专著,并形成了“从社会来诠释思想演进”的学术范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

学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现今的学者按照朱成甲先生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其成果很难超过朱成甲先生《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的水平。故而,研究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只能另辟蹊径。笔者尝试从中外文化比较的视角来诠释李大钊早期思想,写出《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思想文化》的专著,重点说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近代西方文化、近代日本文化、近代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与近代中外思想家、学者有怎样的关系,从而使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具有中外文化诠释的视域。举这两个例子在于说明,不同的诠释方式,对于产出不同的研究成果是有很影响的。在既有的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中“精耕细作”,就需要对既有李大钊研究中的诠释方式加以更新。

三、不断开辟李大钊研究新领域

李大钊研究不仅要在既有的研究领域“精耕细作”,而且要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李大钊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并进一步开拓李大钊研究的空间。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困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找不到新的研究领域,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寻找。笔者以为,关键是研究者在知识基础、研究视域、研究能力与研究经验上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对李大钊一生主要思想、学术、活动的整体把握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也就可以找到李大钊研究的新领域。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可以在这样几个领域做进一步研究。

(一)李大钊与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在五四运动时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李大钊对国外的思想文化予以积极地关注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值得学术界加以重点关注。譬如,李大钊早年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就有很多的看法,对日本思想文化界及其重要人物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与研究,主张开展中日文化的交往与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大钊又重点关注整个欧洲的局势,对于英国、法国、德国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文化状况有着自己的看

法,并在关注欧洲的同时进而研究俄国的十月革命,从而成为宣传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早期李大钊对于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艾默生、英国的穆勒、俄国的托尔斯泰等进行过重点的研究,在文化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一些主张,因而早期李大钊也成为放眼世界、引进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早期李大钊提出“文化调和论”,一方面在对十月革命研究中提出“第三新文明”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对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第二次大的贡献,因而他早期的中外文化观既有中国本位又有世界视野。又譬如,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其所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工作中,比较充分地汲取了西方文化(主要是西方近代文化)与学术的重要成果,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统合,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视域之中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故而李大钊在当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并体现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可见,“李大钊与中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值得开垦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并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又因为“文化交流”的研究,比较切合当今中国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形势、新需要,故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二)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在 1989 年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时,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李大钊与共产国际》^[1]的文章,开启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其后,也有少数学者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但大体上未超出向青教授研究的高度,故而也没有形成这方面的专著。现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已经解密,北京图书馆出版了几十卷的这方面的资料,我的师妹李颖(中共党史研究室教授)据此写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博士论文,出版后在学术界有重要的影响。我想,根据已经解密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几十卷资料,也能够写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这样的专著,从而使“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这个研究领域

走向成熟。目前,“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学者在承继向青教授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应该说是大有前途的,其成果及其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

(三)李大钊的外交思想

李大钊早期是政论家、报人的身份,其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学术大家以及文化名人,还有外交思想也是李大钊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李大钊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没有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尽管有少数学者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总体上说,关于李大钊外交思想的研究,大都是片段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全面,掌握的研究资料还不够充分,所形成的还只是阶段性的研究结论,还没有凸显李大钊外交家的一面。现在,系统而又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的资料条件已经具备。1999 年人民出版社五卷本《李大钊文集》及此后于 2006 年出版的五卷本《李大钊全集》,都收录了李大钊就义前在北方活动的相关文献,主要是李大钊领导国共合作后北方国民党组织的文献,其中就包括李大钊与北京的外交使团交涉的情况,既有与法国、英国、美国的交涉,也有与日本的交涉,有些是李大钊亲自去做的,有些则是李大钊安排李石岑等人去做的。李大钊此时的外交活动,秉承的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理念,主要目的是使帝国主义国家与张作霖脱离关系,支持南方的北伐战争和武汉国民政府,至少使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如果能联系早期李大钊反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在对德宣战时的外交态度,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对日外交思想,以及李大钊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外交活动(不仅仅是与英、法、美、日的外交活动,也包括为策应冯玉祥参加北伐而与苏联发生的外交活动),从而将李大钊一生中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贯穿起来,并紧密联系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特点,则“李大钊外交思想”研究一定能成为一个成熟的

研究领域。

(四)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李大钊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先驱和引领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开创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这没有任何异议。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是从五四时期开使的,此时的文化建设不仅有着古今之争,而且也有中外之争,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其情形十分复杂,需要加以系统研究。这就不能不涉及李大钊的文化思想与文化活动。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最早是在“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问题的研究中涉及的。这些年来(主要是最近15年来),关于“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但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这里,所谓“有较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之争”问题,二是“李大钊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三是“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问题。今后,需要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李大钊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这不仅涉及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问题。

(2)李大钊为现代文化建设做了哪些基本的工作,在当时的文化斗争中提出怎样的具体主张,又是怎样批判地继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主张。

(3)李大钊的文化建设思想表现出怎样的特点,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文化、近代西方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

(4)李大钊的文化建设思想与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有着何种关系,李大钊的学术努力尤其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对于其文化建设活动有着怎样的作用。

(5)李大钊的文化建设思想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有着怎样的影响,哪些地方得到有效地继承与发展,又有哪些地方未能受到重视

甚至被忽视。

以上几个方面,如果得到扎实而又有效的研究,则“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当然,这个领域的研究,困难还是有的,而且也是比较大的。一是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充分地掌握和理解新文化运动,而且要对整个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有切实的把握,没有这样的视域很难使研究工作进入较高的层次;二是要求研究者具有文化学的知识,研究者如果没有文化学的知识基础,如果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没有充分的认识,也就很能抽绎出李大钊对文化建设的贡献;三是要求研究者具有“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域,能够在现代学术发展体系中认识和把握李大钊的文化思想,这是因为文化思想对于学者特别是像李大钊这样的学术大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学术的研究之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探索之中。笔者相信,李大钊研究者经过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李大钊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一定能够成为比较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

(五)李大钊与北伐战争

李大钊自五四运动直到牺牲,除在大学担任教职外,主要是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就离开北大而专职于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和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工作,这是李大钊一生中革命活动的重要部分。然而,由于资料的原因和研究工作不够深入,学术著述对此的记载大都是粗线条的,关于李大钊对北伐战争的贡献也没有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吴家林撰写了《李大钊与北伐战争》^[2]一文,对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此期间,阎稚新等写有《李大钊与中国革命》专著、肖裕生写有《李大钊的军事活动》专著,这两部著作主要记载了李大钊在北方的军事活动与军事思想,同时也涉及“李大钊与北伐战争”这个问题。但就当时的整个李大钊研究界而言,“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999年,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五卷本《李大钊文集》，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李大钊在北方活动的相关文献，这为研究“李大钊与北伐战争”提供了条件。其时，朱志敏教授已出版《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曾建议我以“李大钊与北伐战争”为题作专门的研究。朱成甲教授非常关注笔者的李大钊研究，还专门开列了研究“李大钊与北伐战争”所需要资料的目录，如《中共中央文献选编（2）》《冯玉祥日记》《冯玉祥传》《冯玉祥回忆录》《蒋介石日记》《蒋介石年谱》，以及联共与国际文献汇编等资料。但当时由于专注于《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博士论文，未能就“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写出专著。在博士论文完成后，继续业已进行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一书的写作，遂在该著第五章专门撰写了《配合国民政府的政治现代化运动——北伐战争》部分，从“动员冯玉祥国民军策应北伐战争”“对北洋军阀的分化和瓦解活动”“动员阎锡山参加北伐战争”“为北伐战争开展外交活动”这四个方面^{[3]187-218}，比较具体地论述李大钊对北伐战争的贡献。

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李大钊与北伐战争”的研究，涉及国共合作、军事战略、统一战线、外交活动等诸多方面，因而需要进行整体的规划。现在看来，“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还有不少具体工作要做。

（1）要处理好“李大钊与北伐战争”和“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间的关系。北伐战争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北伐战争，故而李大钊在北方所开展的活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秉承着国共合作的政治意图及其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因而也就需要凸显国共合作这个大背景。

（2）要阐明李大钊“国民革命思想”在“李大钊与北伐战争”中的地位。李大钊在北方的革命活动及为支持南方北伐战争所做的工作，是在其“国民革命思想”支配之下的，因为所谓的北伐战争在根本上乃是“国民革命”的重要表

征，因而在研究中要从思想与行动统一性方面阐述清楚，这对于阐明李大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与实践也十分关键。

（3）要研究清楚李大钊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之间的关系。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条件之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中国国民党党员不少是在李大钊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李大钊既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同时又是中共北方区委的领袖，特别是在徐谦、顾孟馥等离开北京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就是由李大钊来领导的。故而，李大钊在北方为北伐战争所做的大量工作，有些是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名义进行的，有些是以中共北方区委的名义实施的，在研究之中就要加以区分并给予事实性的说明；同时还因为北伐战争关涉国共两党，且是在国共两党合作下进行的，那就需要对于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合作关系作出研究，并阐明李大钊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4）要说清楚李大钊在北伐战争中统战思想与统战艺术。李大钊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活动，在北方的革命活动中有着突出的体现，并构成了李大钊对北伐战争作出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在北方，争取吴佩孚部下的努力（主要是争取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等反吴力量）、对鲁系军阀张宗昌的统战工作、瓦解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活动（主要是派杨度、李石曾等去做杨宇霆的工作）、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等，就是统战工作的突出事例。可见，统战工作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于此，研究“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必须将李大钊的统战活动、统战思想及统战艺术作为重点之一，这不仅有助于认识李大钊对北伐战争的贡献，也有助于深化“李大钊统一战线思想”的研究。

（5）要阐明李大钊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在军队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的研究，既然是涉及战争，那就有军事问题及其相关的军事战略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这主要是李大钊通过指导冯玉祥国民军策

应北伐战争来表现的。这个问题学术界在研究“李大钊军事思想”中有所体现,但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間。在笔者看来,起码应重视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指导国民军坚守南口,策应北伐军两湖作战”;二是“推动国民军五原誓师,配合江西战场的开辟”;三是“协助冯玉祥制定方略,为中原会师奠定基础”;四是“领导国民军政治工作,加快对国民军的改造”。可以说,关于李大钊的军事战略思想的研究和在国民军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乃是“李大钊与北伐战争”问题研究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之一。

(6)要凸显“李大钊与北伐战争”在李大钊北方革命活动中的地位。前面已经说过,学术界关于李大钊在北方活动的记述是粗线条的,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李大钊在北方活动的研究不充分、不细致、不深入,很多方面的论述流于“概论”上,相关性的事实依据不足。其实,李大钊在北方的革命活动非常广泛,如在北方的建党活动、在北方搞好国共两党的合作工作、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工作、在北方开展北伐战争的相关工作、促进中苏协定的签订、领导北方的国民会议运动、领导三一八运动、在北方开展思想文化工作及教育工作,等等。学术界如果能作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就能正确认识“李大钊对北伐战争的贡献”问题在李大钊北方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也有助于凸显李大钊的革命家形象。

李大钊研究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李大钊研究方法问题,也应是研究中的题中之

意。关于李大钊研究方法上不断开拓问题,笔者在《近10年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提出可以在史学方法的基础上,适当地使用文化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又譬如,“李大钊研究史”的研究,也是李大钊研究界应该重视的。早在2004年,在唐山召开的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上,张静如先生提议学术界写一部《李大钊研究史》,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学术史的基础,使研究工作少走弯路、少炒冷饭,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李大钊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于是,笔者写出了《李大钊研究史》,下限截至2004年,载于《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一书中,成为“外二种”中的一种^{[3]283-425}。笔者关于李大钊研究史的探索也是初步的,李大钊研究史还会续写新的篇章,这对于总结李大钊研究的得失、使研究者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很有作用。

参考文献:

- [1] 向青.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M]//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2] 吴家林.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M]//李大钊研究论集.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
- [3] 吴汉全. 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夏玉玲)